

牛金星事迹考辨（下）

来 星

五、是非功罪

明末农民军史料，尚待做一番汰伪存真、汰浮存实、汰粗存精的清理。在核实史实真象的情况下，引出一些什么来，以为借鉴。否则即或是好心的论断，亦容易流于架空立说。历史学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的制约意义视此。

牛金星的是非功罪，三百多年来，除了正统史书的一例咒骂，本来是没有成案的。而近几十年中，逐渐形成一种口碑，在义军中李岩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作为大顺朝丞相的牛金星则是一位反面人物。其口蜜腹剑不让李林甫，其贪狠奸佞直与秦桧、贾似道、严嵩比肩。

何以把牛金星搞得如此不齿于人列呢？《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下简称《甲》文）说过这样的话：

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责任。

又说：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

永远值得回味的。

无疑今人对牛金星的口碑，主要是受了这些话的影响的。

但在我把牛金星的已知事迹考察之后，不能不认为，《甲》文之褒李岩贬金星及对金星的“功罪”的评定，是由于作者当时限于资料和对资料缺乏严格鉴别，做出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是抗日战争的过来人，不否认在民族危机达到顶峰的当时，《甲》文的写就与发表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它的确是适应当时斗争需要所写出的一篇带有传奇色彩的，十分生动的具有很强感染力的政论性文章。它对明末农民战争所倾注的思想感情，对研究这一史实所起的启后作用，都是值得称道的。其功不可没。但从已有的材料看，它的一些结论却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就是说它对牛金星的功罪评定，是不能做为历史定评的。

李岩其人其事，清初就有人怀疑，其乡贯至今没搞清楚，这里不予讨论。

牛金星投入农民军后，最早作为李自成的“谋主”，后又作为大顺朝的丞相，为义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事功远非箭垛式人物李岩所可比拟。举其要者有三：

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末率领为数已甚少的旧部，由鄂豫陕边（约今河南省浙川县的荆紫关）入豫，是义军的一大转机。甲申史籍或把它描述为“如虎出柙，遂不可制”（《豫变纪略》），或称之谓“败而复振”（《明季北略》），无疑这些估量都是正确的。这一转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这时河南连年旱蝗，闹得“洛中斗米钱二千九百”，“大饥，人相食，群盗大起”（均见《豫变纪略》），于是饥民从者如流。这是天灾为直接机缘，朱明王朝把灾民推到了义军的一边。主观上是李自成在作风上也有一个前后迥异的转变，由原型的农民造反进而有“逐鹿”之志。后者与牛金星的入伍及其指划是有直接关系的。金星教自成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无疑是最重

要的一着。破洛阳，战豫西，自成军骤至数十万，遂成为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其他农民军无法比拟的强大军事力量。崇祯朝廷也正是到了这时，才认识到李自成是最大的腹心之患。《豫变纪略》有一段话说得最好：

按明末群盗李自成最为雄杰。乃其初起也，岂遂有妄意帝王大志哉？不过好勇疾贫而人又疾之已甚，不得已荷锄揭竿挺而走险，如釜鱼桀兽思苟延旦夕耳。智略不如高应登，骁勇不如罗汝才，权谋不如张献忠，而能为群盗冠者，虽目不识丁而用人能尽所长，则罗汝才之与玄珪、张献忠之于潘独鳌莫及也。彼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战而纵之壑，出于桀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鸦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金星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闯贼之“三堵墙”，盖金星变化而为之也。况值岁奇荒，加以福藩之积蓄，洛阳一破而呼号有资，饥民之归如流水，亦自然之势也。（卷三）

他把李自成在“败而复振”之下，继而有“海阔天空之望”及“妄意帝王大志”，正委之于牛金星的诱劝。所谓“两凶相济”，我们今天自然应读作“两雄相济”的。这“两雄相济”，正是自成与金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写照。

惟何人为自成划策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这件事，史籍说法不一。或单言牛金星的，如《明朝纪事本末》^④及《豫变纪略》，后者不承认有李岩其人。或单言李岩的，如《绥寇纪略》及《明史》。或以牛金星、李岩与宋献策三人并举的，如《石匱书后集》及《鹿樵纪闻》^⑤。我是宁取前者及后者，而不取《绥寇纪略》及《明史》的。平情而论，或主或从，三人——假若实有李岩其人的话，可能都用这些话劝过自成。《甲》文却独属李岩，一字不提及金星，似欠公允。

《石匱书后集》有一段文字，对“金星等”促成自成军风

的大转变，也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可与《豫变纪略》印证。两书亦绝少抄袭之嫌的。

金星等教以假行仁义，收拾人心。所得州县遂设官守之。……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迒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掠。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集镇，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为安。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卷六十三《盗贼列传》）

张岱深怀亡国之痛写了此传，认为明之亡“皆人事之失”，谋国诸臣虽“寸斩”不“赎”^⑥。谷应泰以清朝命吏的身份不敢写入其书的，张岱在这里写入了。所称“金星等”，按前文脉络，指牛金星、宋献策及当时塘报或有记述的李岩三人。然“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张岱未独属李岩，认为乃出自在朱明朝廷“敲扑煎熬”下“不堪命”的农民之口，这比之《明史》独属李岩的说法，似更合乎实际一些。《甲》文据《明史》而判定此事，似也失之武断了。

总之，有了金星等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入伍，无疑是在义军领导集团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一定程度的转变“流寇”习气，有着重要影响。而这批知识分子是以金星为首的。此其一。

随着义军的迅速成长与攻陷北京，金星为大顺朝规划了朝政典章，有似萧何、叔孙通之于刘邦，而李岩不与焉——由现有史料是可以这样讲的。

自成得金星为谋主后，由最初一段军事行动看，欲效宋祖故事，是谋取地处四战之野的开封这一坚城，以为逐鹿的立足点。三围不克，河决城沦，遂南走江汉谋取另一立足点。既得襄阳，乃改襄阳为襄京，创立官爵名号，设官分职，大加署置。又向已抚定的湖广、河南诸府州县，派出与任命了各级军政官员，守土不流。应该说，这是在牛金星的谋划下，李自成在政权建设上迈出的第一步。就在这时出现过一个小插曲。李自成破承天时，降义军的明钦天监博士招远杨永裕曾劝进，“牛金星不可，乃止。”（《明朝纪事本末》、《绥寇纪略》并载）“自成外虽寝永裕议，而心善之”（《绥寇纪略》）。金星止之，较自成是有远见的。不然会在明王朝及张献忠两个不同方面，把李自成置于目标过分暴露和孤立的境地。

汝州战役击溃孙传庭，明王朝无复有与义军角逐的力量。自成遂长驱入潼关，抚定三秦，进陷兰州、西宁，旁略三边，称王于长安。旋即出兵山西，直捣京师。这些重大决策，牛金星一直是李自成的辅弼，也未闻李岩有何措置或建言。在长安与北京，牛金星为大顺朝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包括改元、造历、军政、吏治、爵赏、礼仪以及铸币、赋役等等，有因有革，有废有置，虽疏而不陋。于此谷应泰、吴伟业及《明史》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譬如改六部为六政府，六科为谏议，十三道为直指使，巡抚为节度使，兵备为防御使（以上均据《明史》），在名实相副上均甚可取。惜无《大顺会典》传留下来，今天已无法知其全貌了。《甲》文很称赏《明季北略》和《剿闯小史》所载宋献策和李岩关于“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的议论，其实牛金星对科举制度正有过改革的尝试。如《绥寇纪略·通城击·附记》中载有这样一件事：“牛金星尝在华州考诸生，其题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文体改八股为议，中格者为县令。”《鹿樵纪闻·自成犯阙》则称：“遣官考州县生童，改八股为

论。”改八股为“议”或“论”，是一种卓识。至于大顺朝在长安及北京两开科场，可以想见是出于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通过考试选官是隋唐以来延揽人才的主要方法，有其弊亦有其利的。顺治初何尝不是迫不及待地开了“加科”？对此目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似为偏执之见的。许多材料表述，牛金星有长者风——这对一位丞相是至需的，如在京不迫使赵士锦受职^⑦，在陕责耿始然治狱无所平反及力救巩焄等是^⑧；并非急功好利，忌刻贪得，及慍怵伎求的人。拷饷，绑票敲索，处理吴三桂问题及山海关一战的失利，都不能让金星一人负“专责”的。绑票敲索是破产农民或溃散兵弁“拉杆子”的积习，拷饷是在长途、长期流窜中取得补给与财物的简捷方法。牛金星既劝自成少刑杀、收民心以争天下，又引导自成设官守土、安辑流亡，他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攻克北京之后，天下已是自己的了，何愁污吏之不除，军饷之不继？把“流寇”作风及“拉杆子”积习带进北京，应主要由义军的老班底如刘宗敏等负责，或者说应主要由李自成负其对老班底的严重缺陷不自觉或失去约束的责任，这是不能由牛金星一人负“专责”的。历史的悲剧意义，并不发生在李岩身上，也不发生在牛金星身上，适然发生在李自成自己身上。此其二。

牛金星加意为李自成延揽与招徕了一批人才。宋献策的人伍，出于牛金星的荐举。上文谈到的欲招致襄城耿应庚也是一例。可惜初年的事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只能就一斑窥全豹。及至在襄京、在长安、在北京，风云际会，招徕如流，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子。如石首喻上猷、江陵萧应坤、招远杨永裕、江陵邓严忠、西安姚锡胤、郟县李之纲、襄阳陈可新、乾州宋企郊、平湖陆之祺、真宁巩焄、归安张麟然、韩城李化麟、盐山杨王休、华容黎志升、商丘侯恂、信阳何瑞徵、武进杨廷鉴、吴县项煜、金坛周钟、祥符史可程、项城周颢、新乡张缙彦、

祥符刘昌、桐城光时亨、孟县薛所蕴、九江叶初春、登封傅景星等等。其中不乏不世之才。甲科投义军者，以崇祯十六年癸卯科馆选最多，尤多年齿正茂的俊彦。可惜短命的大顺王朝，未能使这一班归命者一展怀抱。在牛金星为首延揽的人才中，以豫、鄂、陕籍居多，如侯恂、黎志升、宋企郊等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是崇祯十三年后自成军事活动的主要地区；一方面旧日重乡、族及师生年谊，用为通声气及荐引的手段。我认为不能把牛金星的“筹备登基大典，开科选举，招揽门生”以及《甲申传信录》所描写的“大轿开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视为莫大的过错。“大轿开棍”是必要的仪卫（牛是丞相），“玉带蓝袍圆领”是大顺朝的服制（色尚蓝）。“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固可以理解为摆排场的世俗应酬，也可以理解为稳定京城初定局面所需的政治性应接，从字表是没法定讞的。更不必说“登基大典”为皇统隆替的大事了。试想历史上有哪个开国皇帝，不是在时机有成之时立正大统、以号召天下的呢？至于“洒金扇上贴内阁字”，或可说牛金星未能免俗罢，但责之以“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却未免失之过苛了。

提及襄阳陈可新，使我终不能忘怀一件事。据李宏志《述往》，他是湖广新科举人，于崇祯十六年之任宝州，榜大堂柱云：“掌宝州一颗印秋肃春回，受百姓半文钱天灾人祸。”同年汝州战役，孙传庭破宝州，被俘遇害。这是罕见的资料。对联并不工稳，气概是有的。另据《鹿樵纪闻·槐国人政》，义军入京后，“禁奏疏冗长”；“易乾清宫匾‘敬天法祖’为‘敬天勤民’”。均可藉窥以辅弼牛金星为首的大顺朝的官风仕习。此其三。

或者有人要问：牛金星为李自成设计的只不过仍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延揽的充其量不过是“致君尧舜上”的臣工，岂不使农民革命夭折了吗？是的，原本如此。萧何、叔孙通领

刘邦走的是这条路，李善长、徐达、刘基领朱元璋走的也是这条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于萌动时期的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只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能是“江山千年换百主”；牛金星于李自成也只能是“日讲经一章，史一通”，设计不出别的什么方案的。其实就在李自成的老班底里，又何尝没有帝王思想？譬如李自成死后，其兄子过改名锦，奉自成妻高氏降于何腾蛟，唐王赐锦名赤心。其具疏仍称自成为“先帝”，奉高氏为“太后”。隆武廷臣隐忍听之^⑨。

据别记，牛金星最大失德处是谗杀李岩。有的文章正是主要依据这个事件，肯定李岩而否定牛金星的。而这个故事流播于江南，中原无闻，虚幻与演义的成分是很大的。态度较审慎的谷应泰、张岱、郑廉及清初大量杂史、笔记均不记（小说、戏曲除外），独详于《绥寇纪略》，后为《明史》取资。《明季北略》亦叙及，尤荒唐。

把《明史》与《绥寇纪略》对勘，会发现这个故事是经过润饰修补而成型的，虽然仍有未缝合好的破绽。譬如李牟，两书中都是在崇祯六年冬渑池渡之后即已出现，乃随高迎祥来自山西^⑩，如何至此反成为李岩的弟弟？李牟不仅不是李岩的弟弟，多分不是河南人。又如《绥寇纪略》叙述这个事件，开笔有“金星以自成为不足辅，颇有怏怏心”一句话。为何在牛金星以自成不足辅、胸怀悒郁不知何以终其事时定要谗害李岩呢？显然心理根据无当。于是《明史》把它删去了，漏洞得以弥补。《绥寇纪略》记述这个事件用了四百六十七字，《明史》删省至二百四十八字，固因有冗词，更多的则为经不起推敲。这么一改，合乎史裁了，周严了，也掩盖了它本来的纯属传闻及小说家言的原貌。

《明季北略》是在《李自成死罗公山》条下记述了这一事件。它未把李岩、李牟定为兄弟，是不同于吴梅村的异闻。其他情节的疏漏，甚有超出梅村者。如在“将相离心”之后，还

写有“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实则宋献策并未他往，刘宗敏亦未赴河南；两人一同跟随李自成、牛金星经山西平阳撤回关中。待次年豫王多铎兵临潼关时，刘宗敏还与之对阵^⑩；李自成撤离西安南奔湖广时，刘宗敏、宋献策一直随侍在侧；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后，刘宗敏、宋献策又一齐做了俘虏，刘宗敏且遭杀害^⑪。

《明季北略》基本是杂集江南传闻、街谈巷语及野记小说成书的。语多不经，《补遗》（卷二十三）部分尤无稽。关于李岩的记载，添枝加叶，愈写愈细，多为小说家言，难以令人征信。

《明史·李自成传》同样是草率的，不仅对吴梅村遽信不疑，且有纪年错误。我疑心史馆诸公对明、清衔接的事件，连《顺治朝实录》都未利用——或别有缘故？譬如它把清兵之破潼关、义军之弃西安置于乙酉二月，把自成之死置于乙酉九月，均为误书。据《清实录》载豫王多铎两次奏报^⑫，清兵于顺治二年（乙酉）正月十一日进逼潼关口，十二日克潼关，当十八日抵西安时，李自成已先期于十三日出蓝田口溃奔湖广。少俟抚定，豫王即返师东下，至二月十四日已由西安抵河南（洛阳），其迅捷如破竹。另据《清实录》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英王阿济格奏报，时自成已死于九宫山多日了（月日未详），“遗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同年八月癸未英王已班师返抵芦沟桥，自成岂有死于九月的道理？《明史》之误是显而易见的。

前边提到，真定一败之后，《绥寇纪略》言“金星以自成为不足辅，颇有怏怏心”，自然这不能做为谗杀李岩的心理动机，但却说中了李自成与牛金星之间的间隙。这种间隙，初在西安时就存在，待牛金星目睹与“收人心，争天下”相反的“拉杆子”习气复在胜利中的北京城膨胀与肆虐，加之山海关、真定诸战的失利，间隙也就加大。其本有“自成为不足

辅”之感，《豫变纪略》卷六所载下面事例可为佐证：

初贼在西安时，牛金星实执其政。其姻有某贡生者，往依金星求官，金星不许，曰：“世方乱，君庸可仕乎？”贡生曰：“公伐燕将无功耶？”曰：“师至则破，谁谓无功？”曰：“燕既破则天下定矣，公何谓不可仕？”金星喟然曰：“是非君所知也。君亦尝读书，试问天下有如此君臣乎？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吾之为此，聊以避祸也，宁知税驾何所乎！吾行矣，君可疾归，勿与斯祸。”贡生不谓然。金星遂与贼入晋。贡生犹在金星所，心怏怏。后数月，贼还西安，其经营规模颇不与前日相类。贡生怪之，诘其状，金星悽然不语，但呼曰“奈何”而已。每入贼庭议事，尝经日不出，其后或连数日不出。盖贼边事孔棘也。一日出为贡生置酒，饮间忽叹曰：“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遂呜咽流涕而罢饮。明日，金星早入，贡生亦不辞而出居逆族，自是遂不与金相相通。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即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急往应之，而其实英王未来也。豫王抵潼关，关中卒无几人，遂长驱而入。贼方筹画御北鄙，而潼关溃卒残甲断鞅而带伤者踵至矣。贼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蓝田。……贡生者盖求为贼而不得者也。后为洛阳训导，与夏邑彭公泽同官，尝自言其事而不讳也。

“师至则破，谁谓无功”，对义军马上争天下，牛金星是不怀疑的。这时自然他还逆料不到清兵的迅速藉机入关。“试问天下有如此君臣乎”，是金星对义军的素质抱有隐忧，因为它必然要把李自成和他自己的成败牵连进去。“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作为丞相，这是他对李自成能否下马治天下，本来就抱有疑惧的，及至义军或公或私仅仅得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撤出北京返回西安后，李自成“既屡败，复刚狠自用”^⑭，不足辅之感也必然增浓。虽然如此，在回西安的半年中，牛金星

仍然忠于职守，每人计事“尝经日不出，其后或连数日不出”可证。据《明朝纪事本末》及《明史》并载，这个时期李自成图谋固关中以东向争锋，一为发兵取汉中，一为安抚河南，牛金星理当预其谋。及至自成兵溃湖广，金星既未降何腾蛟，亦未降清，初返宝丰（据《豫变纪略》），后匿于子侄官署，赍志以歿。其于李自成虽有“快快心”，仍然竭尽心力以辅，盖棺论定，未足为人品累的。然也不宜对牛金星做过高的评价，他也只能是一个“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民为邦本”的正统知识分子而已。他作为大顺朝的丞相，对大顺军的失败，自然也不能辞其咎的。

话再说回来。大凡甲申史籍，约分数类：一据亲身闻见成书者，《甲申纪事》、《燕都志变》、《豫变纪略》等是；一据塘报及其他资料成书者，《明朝纪事本末》、《石匱书后集》等是；一兼采塘报及传闻者，《绥寇纪略》、《鹿樵纪闻》等是；一杂集众说兼及小说家言者，《明季北略》、《櫓机近志》等是；一属于文学作品对原事件以臆多加增饰者，《剿闯小史》、《芝龕记》等是。它们的史料真实性也随之等而下之。至于《明史·李自成传》，主要采自《绥寇纪略》，也就无需别自为类了。当然这是就著书格调及主要材料来源说的，并非说它们随之也就全是或全非，不排斥后者亦保留有珍贵史料。《甲》文主要是在取材上太相信了《明史》、《明季北略》甚至《剿闯小史》、《櫓机近志》等书，为小说家言所惑。特别失访《豫变纪略》及河南方志，忽视李岩其人清初以来既有争议，致对其事迹深信未疑。现在需要指出它的缺陷，为李岩减色，对牛金星重新做出公正的评价；为明末这一伟大的农民起义的失败找出真正的原因，进一步科学地论定包括李自成在内的重要人物的历史功过，以引出教训。郭老健在，也必同意这样做的。

李自成究竟何以失败了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我看来，

自成所以失败，客观上是在他颠覆了明王朝之后，又遇到了比他的军队更加善战、更加讲策略的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部队。刘邦及朱元璋并不比自成多生三头六臂，所幸的是未碰上这种“三角关系”。此即不以成败论英雄。主观上的原因，则应到李自成自身和他的基本班底的素质、历史局限及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中去找寻，自然也包括牛金星在内。“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糲，与其下共”（《明史》），是自成的长处，也是人所共知的，然仅仅如此，何足与言天下事？这个问题已溢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不详说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写定

注：

- ① 我发现这篇《事略》之后，当时曾抄给郑州大学王兴亚同志。近知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摘引。
- ② 《述往》一卷，我现在正进行校勘整理，将交付出版。本文录引的章节均文字上确切无误者。
- ③ 引文据一九七二年二月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印本。
- ④ 《明朝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先是，贼好杀掠，牛金星劝以不杀，遂严戢其下，民间稍安堵。辄相诬惑，人无斗志。”
- ⑤ 《鹿樵纪闻·闯献发难》：“三人（按指宋、李、牛）始教贼收人心，据要害，以争天下。又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远近，于是归贼者弥众。”又《槐国人政》：“闯贼本无大志，自得牛、李后，始知收拾人心。”
- ⑥ 见李自成传论。
- ⑦ 《甲申纪事·北归记》：“亭午，伪相牛金星、刘宗敏执册点用，凡九十六人。用者立北面，点者南面。列予在点用中。予出而辞之，金星曰：‘非尔所愿，则亦已矣。’因进而请曰：‘累囚惠徼先世之灵，得归死于宗社，幸养慈母以终。’金星点头。仍发旧禁所。”
- ⑧ 《绥寇纪略·通城击》：“耿始然为刑政尚书，……惧失自成

指，于刑政所奏讞，辄当以死。金星谓之曰：‘君为其职，奈何无所平反？’始然稍敢争执。”又：“巩焞之为礼政，自成命以更定威仪服式，雅不称意指，杖之几毙。甲申八月，自成新立其祖祢庙，将以己生日往祀。焞仿古法为山龙袞衣进。自成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炽炭于位。礼卒不成。怒焞曰：‘若移两山于肩以厌我。’将加戮，金星力救免。”

- ⑨ 据《明季北略·李过降何腾蛟》。
- ⑩ 《绥寇纪略·车箱困》：“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至楚豫（按指澠池渡之后）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明史·流贼传》：“及入河南（按指澠池渡后），自成乃与兄子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
- ⑪⑫ 据《东华录》。
- ⑬ 据二月乙卯及三月丙申两次奏报。
- ⑭ 《明史稿·流贼传》：“自成始以岩、金星言诈为仁义，既屡败，复刚狠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绥寇纪略·通城击》原作：“既兵败，见齐、晋多杀伪官以背之，辄复狠强自用。”

